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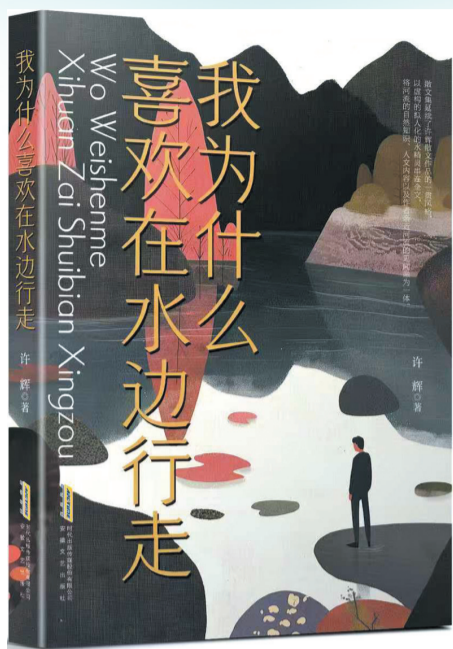
许辉散文的文化根性与存在哲思 ——评散文集《我为什么喜欢在水边行走》

陈振华

许辉是我们所熟悉的作家，他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，诸如《夏天的公事》《焚烧的春天》《幸福的王仁》《人种》《碑》等，被誉为“非经典时代的经典”。他的文学创作一直“在边缘域行走”“寂寞而自在”，作家则被评论界称为“独树一帜的作家”“文学史中的独行侠”。近些年，许辉转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“属己”的阐释，并写下了一系列文化随笔和散文，先秦经典的文化解读与散文随笔的生命体验书写互为镜像，彼此渗透，成就了另一番文学、文化气象。近期出版的散文集《我为什么在水边行走》可以说是这种创作理念与审美追求的最新表达。

许辉在这本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：“作家的任务就是为自己的每一篇作品找到灵魂”。作家做到了知行合一，审美理想与创作实践的相因相契。

他写水边，并非是单纯流连水光潋滟的视觉美感，而是沉潜到水的流动中，从水的周行不殆中感悟文化的生发与自然的节律。写在路上的行走，是让脚步与大地、山河产生真实的触碰。他写野外漫游，则更多强调心灵的不受束缚。空间的转移，预示着创作主体对现代性焦虑的疏离，因为城市空间往往关联着工业文明、物质现代性、世俗生活，加速度、快节奏、内卷的现代或后现代生存状态，导致了身与心的背离，许辉反躬自问，决心去思想、生活的源头去探勘世界、社会和人的来龙去脉，去前现代的混沌哲学、阴阳平衡、儒道思想中去探寻救赎现代生存困境的文化药方。许辉何以选择“水”作为其审美观照的核心呢？“太一生水，水润万物”。水是生命最重要的起源，是人类文明的肇始，是文化发生学的开端。作家以虚构的人格化的“水精灵”贯穿《我为什么喜欢到水边闲逛》，以“水边行走”这一极具象征意味的生命实践，在自然地理和人文记忆的交织中，构建了一座连接文化根性、地域风情与自我精神家园的桥梁。河流的自然史讲述了“水精灵”的诞生、源泉的生成、小溪的出现、河流的成形以及河流上游、中游、下游的物产、街镇、城市。此后河流流入湖泊、水库，最终经过河口汇入海洋。河流的自然史，也是人类的进化史、农耕文明的发展史。河流的文化史



是对河流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赋值、水生成的文化基因，代代相沿。从三皇五帝时代的洪水、《周易·易经》有关水的记载与讲述、农业的兴起、《尚书·禹贡》对河流的叙述、《尔雅》对水的释义、《诗经》关于“水”的审美，还有“兵家”对水的工具化、农家对水的器重，以及先秦儒家以“水”作譬，借喻社会、时光和人伦，或道家以“水”作哲学思辨，演变为一种独有的生活方式、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，凡此种种，作家娓娓道来。而河流的自然史与文化史，又融入了“我”的河流行旅史，融入了切实的生命感悟与体验。正如书的封面所描述的：“将河流的自然知识、人文内容以及作者亲近河流的见闻融为一体”。这也是这本散文集最大的艺术特色。作家的才情、学识、认知、理想甚至信仰都融入其中，以个体的“孤独”姿态，彰显其精神意蕴、情感理路与文化发现。卷一的另外两篇：《我为什么喜欢在路上行走》《我为什

么喜欢到野外闲逛》和首篇《我为什么喜欢到水边闲逛》相互补充，共同构建了作家“反思/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”的价值观、生活观与审美观。许辉这种“田野行走、河流漫步与天地观察”的“在场”生活方式，以生命体验为通道，试图构建当下现代、后现代的生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有效链接，最大限度地纾解现代生存的焦虑与无意义感。

从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的哲学思辨，到“中国人的四季”的时间感知，从“河流边的儒道”的文化溯源，到“中国先秦的兵学思想”的历史探幽以及平原的密码的揭示，可以明显地看出，许辉以“自然”为锚点，为我们勾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走向。

质言之，许辉的散文集《我为什么喜欢在水边走》以极具个人化的视角，将“行走”与哲思熔铸一炉，在水边、路上、野外的步履间，铺展着对自然的深情凝视与对中国文化根性的哲学沉思。这是一本融思想、文化和审美于一体的文化大散文，它跳出了传统游记散文的抒情窠臼，以“行走”“闲逛”为引子，身体的行走成为精神的探险与寻路，某种程度上构建了一种“行走式”书写的文化散文范式，这是许辉对文化大散文书写形态的创新。尤其是长篇文化散文的书写，中气充沛，一脉贯通，气韵流动，随物赋形，推动散文书写从“纪实”向“写意”“思辨”的维度延伸，符合古典散文崇尚的“文气”之说，颇具思想与审美的双重价值，并能给当下文化类散文随笔的书写以深刻的启迪。代后记“我更愿意洒心脱欲、风高振远”道破了全书的精神内核：无论是行走自然还是叩问中国文脉的优秀传统，最终的归宿都是挣脱各种束缚和欲望枷锁，作家将自我融入自然之中，以最朴素的方式感知天地的呼吸，让“行走”“闲逛”成为对抗“浮躁”时代的精神仪式，让心灵在天地间自由舒展。整本书的文字风格质朴而厚重，“既蕴含着深厚的天地魅力，又充盈着历史的劲道苍远”，更有着从“公共经验”向“个体生命体验”回归的真切，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，却直击我们日渐麻木的内心。

（作者为文学博士，评论家，巢湖学院文传学院教授）

卖书记 王传寿

一介草根文人，平生与笔墨相伴，与书卷为友，却也去过两次刻骨铭心的卖书经历。一次为职称生计，奔波售新书；一次为迁居割舍，忍痛卖旧书。两次境遇不同，心境各异，如今回想起来，仍历历在目，满是岁月的滋味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由广电记者转行社科学者。朋友调侃：从“米箩”到“糠箩”。对于当惯“喉舌”的老记者而言，吾以奉命为天职；但“隔行如隔山”，行业转换，看似只是工作内容的调整，实则关乎职称评定的天壤之别。新闻系列重实务，讲究作品真、短、快、活、强，一篇篇“三贴近”的鲜活报道便是最好的实绩；而社科系列讲求厚重与学术味，论文动辄上万字，且须刊发于专业学术期刊，更要有自成体系的学术著作方能立足。好在转行不转业，依然围绕“新闻”转。为了顺利通过职称转评，我将二十余年新闻采、编、审的一线经验，结合彼时社会形势与新闻传播理论，伏案笔耕一年，写成二十万字的《大众传播与现代文明》，交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。

早年出版规则与今不同，出版社免收书号费，却要求自行销售三千册。书稿付梓，油墨飘香，总算拿到转行的“敲门砖”。欣喜之余，卖书的重担便压在了肩头，这便是我人生第一次卖书。好我在新闻界摸爬滚打二十余载，与各家媒体同仁相交甚笃，平日里并肩奔波采访，积攒下深厚情谊。此番为书奔走，登门拜访省市各家媒体，诸位老友皆顾念旧情，慷慨相助，五十本、一百本地订购，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

最令我感念的，是老单位广电厅总编室主任江明安先生，得知我的难处，当即定下两百册，这份仗义，至今铭记于心。原安徽市场报总编刘济民先生人如其名，扶危济困，也倾力相助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这本

小书竟还帮了他一个小忙。刘先生的夫人郑慧新，原是省话剧团演员，我的著作中，除理论篇章外，还附录了五万字新闻作品，其中一篇合作的配音通讯《白衣红心李月华》，当年为在广播中再现英雄的音容笑貌，我们特邀郑慧新演播李月华，算是一次新颖的尝试。播出后效果颇佳，甚至收到了海南岛的听众来信。

彼时广播稍纵即逝，音像制品尚未普及，新闻作品少有录音留存。而我的书中不仅收录了全文，还特意标注“李月华由郑慧新演播”。后来郑女士参评艺术系列高级职称，这本书的记载，恰好成为重要佐证。刘先生事后专电致谢，我说是尊夫人的德艺双馨助力广播通讯出彩出圈。同时心中亦生感慨，一本为己职称的拙著，竟在无意间成全了他（她）人，也算一段文坛佳话。当然也有“碰钉子”的，我送一捆书到一家大报广告科，半月后去收费原封未动。我硬着头皮拆封签名送出十几本，其余捆起来用自行车带回。不过，这次遭“冷遇”也激励我克服“急功近利”毛病，后来沉下心来做学问，取得几项国家及省社科基金项目，写出了几本学术专著，不仅无须推销，还获较丰厚稿酬。

若说第一次卖新书是为从记者到学者的前程奔走，充满人间温情，那么第二次卖旧书，则是文人对心爱之物的忍痛割舍，满是心酸与不舍。2013年，我正式退休后，犬子孝心让我和老伴迁居带电梯的新楼房。旧居有地下室，可存放数千册藏书，这些书籍皆是我半生积攒，有专业典籍、报刊史料及阅评读笔记等，不少都弥足珍贵。比如在兼任“安徽省陈独秀

研究会”副会长期间，收集了不少相关著作与史料，为研究陈独秀新闻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对爱书之人而言，每一本书都藏着时光与心血，如同老友相伴。可新居虽比旧居大，但无地下室，书房与书柜难以容纳所有藏书；旧居无人，担心地下室书籍受潮，几番纠结，终究狠下心来，清理变卖部分书籍。

看着满室堆叠的书卷，指尖拂过泛黄的纸页，心中满是揪紧的疼。这些书，伴我走过记者生涯的日夜，陪我完成学术研究的攻坚，见证过我的奔波与坚守，如今却要忍痛分离。最终，我整理出五百斤旧书，以八毛钱一斤的价格售出。捧着那四百元钱，手心沉甸甸的，却不是喜悦，而是对书卷的愧疚与无奈。

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亦是文人的风骨与寄托。两番卖书经历，藏着半生浮沉。年逾耄耋，再忆往事，只觉岁月无情书有情，那些与书相伴的时光，那些因书结缘的情谊，早已刻进生命里，成为人生中难以磨灭的印记。笔墨生涯，书卷人生，有舍有得，亦苦亦乐。

诗词

参观张治中故居感言

周振东

戎马生涯气浩然，和平将军冠冕銜。
三上延安求共识，几番归梓念故园。
黄麓师范开先河，家国情怀代代传。
指腹为婚结连理，鸛蝶情深成美谈。

注：张治中将军的故居在今合肥市巢湖市黄麓镇黄麓师范学校附近。